

德国的国际角色 与外交政策

于芳◎著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人民日报

德国的国际角色 与外交政策

于芳◎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的国际角色与外交政策 / 于芳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15-2846-9

I. ①德… II. ①于… III. ①对外政策—研究—德国

IV. ①D851.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9624 号

书 名: 德国的国际角色与外交政策

著 者: 于 芳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周海燕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8

网 址: [www. peopledaily. 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6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846-9

定 价: 68.00 元

前 言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际关系理论界兴起了建构主义,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的崛起对德国外交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方法论而言,建构主义从超级理论的个体主义研究转向整体主义,将规范和认同纳入到国际关系分析的视野当中,实现了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这一转向,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语境而言,而在欧洲,国际关系学中的社会学思想和方法有很深的传统,并且构成了欧洲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

德国重新统一后外交政策的走向是德国建构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分析统一后德国外交走向时主要有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其中,德国特里尔大学政治系的毛尔教授及其课题小组为代表的角色分析派,从对国家角色期待的角度出发,开展了关于“文明力量”理论的研究,毛尔教授在 1992 年提出“文明力量”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德国作为文明力量这一国家角色的十四条论点。1997 年,毛尔教授及其课题小组完成了为期三年的研究《1985 ~ 1995 年间德国、美国和日本外交战略比较研究 (Deutsche, amerikanische, japanische Außenpolitikstrategie 1985 ~ 1995)》,对三个国家符合文明力量角色的程度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文明力量模式是研究对象中内化程度最高的。此后,毛尔教授及相关学者始终坚持用“文明力量”理论对德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分析。无论是在红绿联盟政府时期,还是在后来大联合政府和黑黄联盟政府时期,学者们皆从文明力量理论的规范角度来评价德国的外交政策,考察每届政府致力于国际关系文明化所处的框架条件,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毛尔教授等人也在不断向前发展着文明力量,将其适用范围扩大。文明力量这一角色的承担者不仅仅是主权国家,还扩展到国际组织,他们认为,欧盟也符合

“文明力量”角色的特征,那么欧盟的外交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文明力量”的特点,也是德国学者们研究的新问题。

文明力量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文明,在德文中所用的表述是 Zivilisation,对应英文中的 civilization。文明力量的德文表述是 Zivilmacht,取了文明“Zivilis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强调承担这一角色的国家非军事强权的状态,以及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非军事手段。“文明”、“和平”等核心概念令本人联想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即中国不同其他国家结盟,不争霸、不称霸,努力用和平手段实现世界和平和国家的复兴。在这里,文明力量的“文明”是否等同于中华文明古国的“文明”,和平手段是否意味着放弃武装力量和武装行动,是十分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诚然,统一后的德国外交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外交虽然分别植根于不同的外交框架条件下,但二者都看重和平手段、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是否意味着,德国学者也认同中国符合文明力量的角色特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又是什么?本书将对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以毛尔教授及其课题小组为代表的德国学者主要是提出和发展文明力量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两种形式。国内学者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版相关的学术专著,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学术期刊的相关论文中。在某些研究德国外交的专著中,对于文明力量理论也有所涉及。

综观国内学者在这一主题上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1)对于文明力量理论仅有数篇论文加以简要介绍,对于理论的来龙去脉、与建构主义理论的渊源、具体的分析要素并没有系统的阐述;(2)对于“文明力量”这一术语,尚无统一的译法,容易造成学术交流中的困惑;(3)上述著作和论文主要集中在用文明力量理论解释德国外交角色的转变和冲突,对于该理论对德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并没有太多关注。

2003年北京大学的连玉如教授出版了《新德国问题》一书,主要探索德国1990年10月3日重新统一以后在变化了的国际体系中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继续坚持1949年以后西方一体化的根本方向,还是重蹈历史上“德意志特殊道路”覆辙。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对“复合性相互依存”的新世界政治结构的根本看法,它在外交决策上的欧洲化趋势,德国市民社会、利益多元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国内对实行西方一体化和国际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广泛共识等,都保证了德国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现实主义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在

发展援助政策、欧盟宪政政策、北约框架内的安全政策方面,文明力量角色模式都体现出了明显占优势的解释力。

2004 年外交学院的熊炜副教授出版了《统一之后的德国外交政策》,从国际角色的角度出发,分析德国国际角色定位和转化的内外根源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德国新的国际角色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采取的策略。

2010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殷桐生教授主编出版了《德国外交通论》,其中在关于德国战后外交政策的章节中也介绍并分析了文明力量理论。

在中国知网上,分别用“文明力量”、“文明国家”、“文明强权”、“文明强国”、“德国国家角色”、“德国外交”等关键词进行搜索,检索出来的相关论文如下:

《国际政治研究》2002 年第三期上发表了连玉如的《权力国家乎,贸易国家乎,文明国家乎》;

《欧洲研究》2004 年第二期上发表了熊炜的《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

《欧洲研究》2004 年第四期上发表了熊炜的《论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冲突》;

《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一期上发表了李绘新的《试析德国当代外交的不确定性——以角色分析理论为视角》。

《欧洲研究》2007 年第二期上发表了熊炜的《欧洲民事强权——概念、决定性因素及其发展》。

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研究报告、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

该理论的奠基之作是 1992 年毛尔教授发表在《欧洲文献(Europa Archiv)》上的文章《文明力量德国。新德国外交政策的十四条论点(Zivilmacht Deutschland. Vierzehn Thesen für eine neue deutsche Außenpolitik)》,该论文后来也被收录到 1997 年出版的由迪特·森格哈斯(Dieter Senghaas)主编的《制造和平(Frieden machen)》一书中。这篇文章的发表正好是在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之后,植根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之中,并对这一变化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更提出了德国外交政策在这一框架条件下,应当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如何取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世界政治地位。文章中的核心词是文明,这个“文明”取自欧洲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的论著。埃利亚斯研究的是探讨西方环境和历史中,文明、权力、知识与国家诞生之间关系的方法,为理解西方社会与文明演变进程提出了打破传统的视角。毛尔教授认为,德国需要以新思维来观察国际政治,应当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从整体上考察,德国应当主要采用文明力量手段来追求国际关系文明

化的目标。

在前述基础上,毛尔教授以及其他德国学者都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下:

(1)从1994年4月到1997年10月,克努特·吉尔斯特(Knut Kirste)和毛尔教授进行了一项研究,共同撰写了研究报告《文明力量案例研究》,对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进行总结,系统地提出文明力量理论及其主要论点。该报告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国家关系中的角色理论进行介绍和界定,采用角色理论是因为它关注的对象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继而提出了“文明力量”作为一种角色模式,阐述了文明力量角色的概念和界定。随后对文明力量角色模式的解释能力加以评述。该文认为,在国际社会无序状态下,利用文明力量角色模式作为解释路径,可以考虑到制度化合作的形成与维护,能够超越单纯从利益考虑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主体行为,引入“价值、目标、原则和理想”等观念性因素来解释主体行为。这一报告的发表,对文明力量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2)在同一时期,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毛尔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领塞巴斯蒂安·哈尼施(Sebastian Harnisch)、克努特·吉尔斯特等人进行了题为《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策略 1985~1995:关于三角关系中文明化过程的比较研究(Deutsche, amerikanische und japanische Außenpolitikstrategien 1985~1995: Eine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zu Zivilisierungsprozessen in der Triade)》的课题研究,发表了同名的研究报告。该项目旨在借助角色理论和文明力量的理想角色概念,提出分析和评价国际关系中不同外交政策策略的一种方法,并以1985~1995年间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政治目标和外交政策行为为例,对提出的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与“文明力量”的理想角色进行对比。这项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德国、日本这三个主体在国际关系中呈现出的文明力量的特征差别很大,外交角色方面各有特点。比照“文明力量”的理想角色,日本和德国基本上符合文明力量的角色特征,而美国除了具备“文明力量”的要素之外,还具有明显的传统强国(与“文明力量”对立的角色类型)的特征。

(3)1998年,克努特·吉尔斯特撰写出版博士论文《角色理论和外交政策分析:作为文明力量的美国和德国(Rollentheorie und Außenpolitikanalyse: Die USA und Deutschland als Zivilmächte)》,在角色理论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德国和美国二者作为文明力量的异同,其主要研究方法是案例分析和话语分析。结论是:①德国和美国外交政策的角色模式和角色行为有着明显区别。两个国家在可比的

条件下,选择了不同的外交政策策略和手段来处理冲突。②假设两个国家都具有文明力量角色模式的导向,但二者的角色特征强弱程度不同。德国的角色内化程度高,具有持续性。美国外交政策包含文明力量角色的一些要素,但是基于其传统强权政治的趋势十分不稳定,角色特征比较模糊。③某些环境和框架条件有利于建构以文明力量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行为模式。

(4)2000年,佛罗里安·普菲尔(Florian Pfeil)的论文《追求人权的文明力量? 1990~1998年间德国外交政策中的人权(Zivilmacht für die Menschenrechte? Menschenrechte in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1990~1998)》出版,从文明力量的核心价值观“人权”这一角度,对德国90年代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主要从“软”实力着手,集中在文明力量角色模式以价值为导向的特征上。得出的结论是:在话语和目标设置上,德国的人权政策体现出鲜明的文明力量特征。但越深入具体的操作层面,越远离普遍性的导向层面,文明力量的特征就越模糊。德国人权政策最常用的手段——政治制裁和经济制裁,原则上符合文明力量的角色特点,不过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文明力量理论看来,单纯的经济制裁无助于国际秩序的文明化,因此还不能完全放弃使用武力,而军事力量相比在传统强权政治中有了新的功能。

(5)2002年,安奈特·荣曼(Annette Jünemann)和尼克拉斯·薛恩尼希(Niklas Schörnig)合作撰写了《文明力量欧洲的安全与防御政策。自相矛盾吗?(Die Sicherheits- und Verteidigungspolitik der Zivilmacht Europa. Ein Widerspruch in sich?)》,从文明力量的理想类型出发,不再将是否使用武力作为判断文明力量角色的标准,而是提出一个标准框架,文明力量角色模式可以不断向这一框架模式靠近。接下来,作者以此为基础对欧洲的安全与防务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6)其后,海伦·维斯莱斯(Helen Versluys)出版其博士论文《欧洲文明力量:以人道主义救援为例(Europe Civilian Power: the Case of Humanitarian Aid)》,从人道主义救援这一侧面出发,论述了欧盟作为国际政治中重要的政治力量。文中,作者以文明力量理论为框架,分析欧盟委员会在实施人道主义救援中的角色,一方面建立起欧盟作为文明力量的特征类型,另一方面,利用文明力量理论作为分析欧盟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中角色的工具。

(7)2006年,毛尔教授在《德国外交政策手册》中著有一章《文明力量德国》,介绍了文明力量一词中“文明”的来源和所指,阐述了该理论的两个维度:一是从规范导向的维度对德国外交政策起到了很大影响,二是从外交政策的分析维度而

言,角色理论接近外交政策分析的文化视角,文化视角考虑到人们的观念、态度和倾向,从超级理论上看属于建构主义的范畴。在厘清了理论渊源之后,毛尔教授又从德国重新统一之前、之后、2003年后分析了德国文明力量角色的内化程度,并对这一理论的未来发展做出展望:在外交上,德国作为文明力量主要依赖于其伙伴,以及与文明力量角色模式相容的国际环境。

(8)2006年,托马斯·罗迈尔(Thomas Lohmeie)撰写并出版了《文明力量欧洲——红绿联盟政府外交政策的主导原则? (Zivilmacht Europa - Leitbild rot - grüner Außenpolitik?)》,其副标题是德国红绿联盟政府时期对欧洲安全政策的建设,主要探讨的问题是,红绿联盟政府是否在遵循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文明力量理念,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仍在遵循该理念。

(9)2008年,迪尔克·特瑞驰(Dirk Tritsch)撰写的专著《作为文明力量的欧盟(Die Europäische Union als Zivilmacht)》出版,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论证了欧盟的主体性以及欧盟作为文明力量的特点。主要论点是:欧盟形成之前已存在有利于文明力量角色形成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欧盟这一角色的持续发展和深化也明显可见。规定的价值观、规范和阐释不断为后来的条约所强调和内化。

(10)2010年亨德里克·施耐德(Hendrik Schneider)撰写并出版《大联合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2005~2009)》(Die Außen - und Sicherheitspolitik der Großen Koalition (2005~2009) - Stringenz des Zivilmachtkonzeptes?)》,以德国海外派兵的数个案例为基础,对默克尔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进行分析,并对其遵循还是背离文明力量角色做出了解读。

(11)2011年11月,詹尼佛·柔贝尔(Jennifer Wrobel)撰写出版了《权力国家德国,文明力量意大利?:为何两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立场不同? (Machtstaat Deutschland, Zivilmacht Italien?: Warum unterscheiden sich nationale Positionen zur Reform des Weltsicherheitsrates?)》。和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作者运用了建构主义和文明力量理论来分析两国对联合国安理会组成机制的改革立场,但主要运用在意大利对联合国的改革立场,对于德国,作者主要采用了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剖析立场根源。

学术论文部分:

(1)上个世纪90年代,毛尔教授曾撰文《欧洲是全球秩序新的平衡点(Europe the new balance of global order)》,论述冷战结束后,欧盟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2)2000年,塞巴斯蒂安·哈尼施(Sebasitan Harnisch)教授撰写了《剧变后的德国外交政策——文明力量的终结? (Deutsche Außenpolitik nach der Wende - Zivilmacht am Ende?)》,认为德国统一前后的外交政策符合文明力量角色,但将来德国外交政策始终是国际环境、内在建构意志、外在外交伙伴对德国的角色期待三者之间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好的情况下是外力平衡所致。的结果。

(3)2004年出版的《新欧洲——老旧欧盟洲? 对欧洲一体化的提问 (Neues Europa - alte EU? Fragen an den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sprozess)》一书中,汉斯-乔治·埃尔哈特(Hans-Georg Ehrhart)撰写文章《告别“文明力量”样板吗? 关于伊拉克战争后欧盟安全政策的方案 (Abschied vom Leitbild Zivilmacht“? Konzepte zur EU - Sicherheitspolitik nach dem Irak - Krieg)》。

(4)2004年,《国际研究综述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期刊上发表了斯特凡妮·安德森 (Stephanie Anderson) 的文章《欧盟:从文明力量到军事力量? (The EU: From Civilian Power to Military Power?)》。

(5)2005年,安娜·盖斯 (Anna Geis) 博士在《观点 (Standpunkte)》期刊上发表了《作为文明力量的德国和超越军事禁区 (Die Zivilmacht Deutschland und die Enttabuisierung des Militärischen)》。

(6)2005年,纳蒂娜·雅克布斯 (Nadina Jakobs) 在期刊《德国和欧洲外交政策研究 (Studien zur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Außenpolitik)》上发表了《9·11之后的德国安全政策 (Deutsche Sicherheitspolitik nach dem 11. September 2001)》,运用文明力量理论对德国的安全政策进行了分析。

(7)2005年,特里尔大学的克里斯蒂安·斯特莱谢特 (Christine Streichert) 撰写并发表了《德国作为文明力量:通过文明力量方案背景下挑选出的联邦总理施罗德和外交部长约什卡·菲舍尔的外交演说来对德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Deutschland als Zivilmacht: quantitative und qualitative Inhaltsanalyse der deklaratorischen Außenpolitik Deutschlands anhand einer Auswahl an Außenpolitischen Reden von Bundeskanzler Schröder und Außenminister Joschka Fischer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Zivilmachtkonzeptes 1998 ~ 2004)》。

(6)2007年,塔妮娅·A·波尔泽 (Tanja A. Börzel) 和托马斯·里瑟 (Thomas Risse) 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 APSA 会议,合作撰写了《欧盟作为形成中的文明世界力量 (The European Union as an Emerging Civilian World Power)》。

(7)2008年,在德国奥茨豪森 (Otzenhausen) 国际关系角色理论研究会上,康

奈利亚·弗兰克(Cornelia Frank)的论文题目为《文明力量遇到本能的大西洋主义者:比较德国和波兰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Civilian power meets ‘instinctive’ atlanticist: comparing German and Polish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ies)》。

(8)2008年,菲利普·希尔斯(Philipp Sheers)发表了论文《仍旧是文明力量吗?1990年以来德国安全政策的变化(Still a “Civilian Power”? The changing approach i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fter 1990)》。

(9)2011年,塞巴斯蒂安·哈尼施(Sebastian Harnisch)教授在《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德国在阿富汗的角色:文明力量建立国家的两难选择(Deutschlands Rolle in Afghanistan: State-Building-Dilemmata einer Zivilmacht)》,这篇文章对从2001年到2011年间德国的阿富汗政策进行了分析,探索其外交角色中来自内部及其外部环境的预期。得出的结论是,传统的文明力量规范——强烈的民主要求和微弱的军事痕迹——日益受到阿富汗主体的拒绝。一方面,德国的角色日益从解放者转向占领者,另一方面建设国家的困境也逐渐显现,在2011年甚至出现了“冲突性的稳定”。

本书主要由九章组成。

第一章阐述“文明力量”的概念: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明力量?对文明力量角色的内在期待是什么?要达到符合角色的程度这一角色需要什么样的手段?判定是否符合文明力量角色模式的标准有哪些?这一部分的论述中,本人想要说明一点:判定是否符合文明力量角色模式,不宜单纯地用是否使用武力手段作为标准,而是应当建立起一个特点框架,在框架内来分析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在文明力量问题上的内化程度深浅。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本人将主要介绍文明力量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具体来说,该理论的产生植根于国际关系领域建构主义兴起的理论背景,同时也植根于20世纪90年代德国统一后的新外交框架条件中。国家角色是指对处于国际关系格局中的某一国家/国际组织的行为期待,也是对具备这一身份的行为体相一致的国际行为规范或模式。具体到德国而言,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重新统一的和平实现,随着德国政治崛起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德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定位必然发生变化,虽然对角色行为的外部期待变量较多,不太好把握,但是从内部角色期待的角度来看,德国外交行为模式呈现出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联邦德国外交思想的传承,更是对德国新的国家角色所作的应对,伴随着新的国家身份厘清了新的国家利益。德国

学者以毛尔教授为代表,对德国战后身份的转变进行了定性研究,通过对政治文本的话语分析,提出了关于文明力量理论的十四条论点,成为文明力量理论的开端。

第四章到第九章主要探讨文明力量理论和德国外交的关系,尤其是与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的关系。这里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四章考察德国文明力量角色的吻合度。第五章和第六章从文明力量理论的目标——国际关系文明化来分析德国外交政策中文明力量特征的体现,分别从巩固价值共同体和输出价值观的角度来阐述。第七章和第八章主要从文明力量角色的安全观、追求目标的手段来考察角色特征,尤其是联邦国防军的海外军事行动。综观历史,不难发现,德国外交政策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建构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文明力量理论的影响,观念、文化等非物质性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施罗德担任联邦总理时期,似乎是经济利益在与价值观的博弈中占了上风,但实际上,德国外交政策始终没有放弃其传递价值观的使命。而这一使命,在默克尔政府时期变得更加鲜明。例如,对西方民主、人权毫不掩饰的推行,造成了中德关系中的曲折。而民主、人权正是文明力量理论的核心价值观。这里要论述的主要观点是:文明力量理论并不意味着追求绝对的价值观,无视经济利益,而是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实际上给德国外交涂抹了现实主义色彩。冷战的结束以及东西方阵营对立的消除,从国际体系层面上改变了德国的国家利益,德国自身统一的完成,也形成了新的国家利益的观念,而在同超级大国、抑或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国际身份有了相对稳定的界定,德国对西方价值观的推行,本质上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并且,任何外交政策的推行都植根于现实主义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离开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非物质利益的追求便失去了任何保障。

第九章的主要内容是文明力量角色的新发展。在第三届默克尔政府上台后,执政协议中关于外交政策的表述比之以往更为主动积极,但文明力量角色特征并未消失,却多了几份建构意愿和建构能力,并辅以更多的建构手段。

本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文明力量理论的形成和内容,并结合该理论产生的国际环境、国内条件和思想基础,阐述了该理论与德国外交的契合,通过与多个西方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德国是最为接近文明力量角色的国家,该理论几乎是为德国量身定做的外交理论。

本书对文明力量理论的核心论点逐一进行了考察,试图透过该理论对德国外交政策的表述探讨该理论的本质作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德国外交政策对价

价值观的重视体现在两点上:一个是同欧美国家建设价值共同体,另一个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促进,推行西方价值观。这实际上意味着:文明力量理论的战略目标——国际关系文明化——是建立西方文明制度,通过与西方国家共有的价值观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国际影响力,同时通过有条件的发展援助推行西方价值观,谋求更多对西方制度的认可和潜在的原料产地与销售市场,可谓是同时推进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然而,在对华政策中,这种一致性被摩擦和冲突所取代,为了不牺牲国家利益,对价值观的诉求不得不退居到次要地位。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只能起到规范作用,而不能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认识有助于把握德国对华政策,进而把握中德关系。

本书通过考察在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对军事手段的态度以及在国际问题上如何运用军事手段,分析了文明力量理论中的“非军事”原则在默克尔政府外交中的体现,并以德国对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危机的立场为实例阐述了德国外交运用军事手段的原则,为更好地理解德国外交政策和德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参考。

本书关注德国文明力量角色的新发展,并对其外交话语中频繁出现的新概念“建构力量”进行了专门的阐述,对文明力量角色与建构力量角色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德国外交政策而言,文明力量并未过时,建构力量并不能取代文明力量,二者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互相补充的关系。对建构力量的突出和强调与默克尔第三届任期内外交政策的积极性紧密相关。

本书中有两个高频概念:角色和文明力量。其概念在此先做一界定。

角色

根据霍尔斯蒂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其国际角色观念所影响,国际角色观念可以用来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选择。国际角色观念的不同也可以用来解释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不同与变化。

在外交政策分析中,学者们使用了角色理论的基本前提:(1)集体在社会互动日益加强的空间里构建出角色;(2)角色作为社会建构决定了行为主体的认知和行为;(3)外交角色可以被理解为对政治本质的认知信念;(4)角色由自我部分和可变部分组成。

对角色扮演者(个体)的期待在社会环境中形成,这种期待分为两个部分,即自我部分和可变部分,可变部分随着文化和社会规范的不同得到建构,自我部分则形成个人的价值观和认同,在两个部分的共同作用下,角色扮演者形成了一定

的角色行为。在国际关系中,国际社会也对国际角色的扮演者——国家产生期待,国家也以类似的方式扮演一定的角色,形成特定的行为及行为模式。

因而,在本文中,国家角色指的就是国家在国际社会扮演的国际角色。在此,国家角色和国际角色作为同义词使用。

用 *Zivilmacht* 理论来分析外交政策的德国学者们,将国家看作是国际体系中扮演某种角色的行为主体,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内部期待)、国际体系对国家角色的期待(外部期待)、国家角色的扮演以及自身角色转变中的冲突,都不断在互动中进行着演变,最终呈现出来的状态便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明力量

Zivilmacht 这一理想的角色模式包括了外交政策方面的必然性以及国家外交政策的具体目标、策略和工具,并且与特定的角色概念的基本要素相吻合。提出理想类型的各个要素并且据此对外交政策中的角色行为进行检验,便可以解释国家行为。

德文 *Zivilmacht* 在英文中有 *civilian power* 与之对应,这两个说法是文明力量理论在国际上所公认的德语、英语表达。然而,在汉语里尚没有统一的术语与其对应。表达这个概念的难度在于,*Zivilmacht* 作为角色模式具有三层含义:

(1) 它涉及到参与构建国际关系的主行为体,并且这些主体有意识地区别于传统大国强权的目标设置和战略,因此,*Zivilmacht* 首先意味着一种国际关系主体的类别,这类行为体既有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又不似强权大国奉行霸权维稳论,它具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导向和外交政策风格,致力于实现国际政治的文明化;此时,*Zivilmacht* 可以被称作是“文明力量”,强调其“文明化”的战略目标。

(2) *Zivilmacht* 本身作为一种国际角色,也有自己的角色特征,如国民经济发展良好、国家富裕、民主法治建设均达到比较完善的水平,愿意建构国际关系等。此时,*Zivilmacht* 也可被称作“文明力量”,它主要指的是文明力量角色。

(3) *Zivilmacht* 也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即一种外交战略。致力于实现国际关系文明化,就应尽量避免通过不文明的手段来建设国际关系,倡导和平、外交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避免使用武力手段。此时,*Zivilmacht* 所指的“文明力量”成为“文明力量角色”实现其角色目标的手段。

要如实地表达 *Zivilmacht* 的含义,需要根据这个复合词的组成部分来确定译文。德语中 *Zivilmacht* 由 *zivil* 和 *Macht* 两个部分组成,对应的英文是 *civilian pow-*

er。首先看 *zivil/civil* 这一部分的对应。在汉语中,从英文 *civilian* 翻译过来的学者多译为“非军事”或者“民事”,强调其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以非军事手段为主,虽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不提倡使用武力,但其战略目标“国际关系文明化”在译文中并未得到体现。从德文 *Zivil/Zivilisation* 翻译过来的学者多译为“文明”,表明了战略目标中的“国际关系文明化”过程,与该概念的来源联系更为紧密。

其次看 *power* 和 *Macht* 在汉语中的对应。这两个词在汉语中可以表示“权力”、“力量”、“强权”、“国家”和“大国”。部分学者在此前的研究中选择了“国家”的表达,认为德国的国际角色是“文明国家”,这是基于民族国家仍旧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在涉及到欧盟时,选择了用“强权”来表示,认为欧盟是一个民事强权。不过,随着文明力量理论的继续发展,这个角色模式也被适用到政府间组织欧盟,而德国和欧盟都是有外交行动能力的行为体,译为权力并不妥当,译为强权在汉语中颇有贬义,译为国家和大国局限了概念的适用性。尽管“力量”稍显薄弱,但仍不失为一个恰当的译文。

综上所述,那么 *Civilian Power* 和 *Zivilmacht* 指出了该角色模式的行为体类别、国际关系文明化的战略目标、行为体为实现战略目标的优先考虑手段,并且强调了规范与认同的力量,下文中将采用译文“文明力量”,根据其所指的不同,也会视情况而定表达为文明力量行为体、文明力量手段、文明力量角色。

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冷战期间,在对外关系中唯美国的马首是瞻,直到冷战结束、德国重新统一之后,才开始推进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学界也发出更大的声音。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统一后的德国“文明力量”理论产生的背景、理论的内涵、理论的发展和最新动态,通过考察和分析文明力量理论在德国外交政策中的体现,来探讨文明力量理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英语国家的理论总是把握着主导性的话语权,国内的译著与理论的引进,也主要从英语国家的理论入手,较少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文明力量理论进行介绍、剖析和评价,填补空白,拓宽视野,为本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的发展稍尽绵薄之力。

德国不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它因在历史上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为人诟病,也因战后的“经济奇迹”和“和平统一”而备受瞩目。现在,德国和法国一起推动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继续进行,在西欧乃至整个国际舞台上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和德国远隔万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关系,两国都愿意加强双边的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影响德国外交政策的理论之一,文明力量理论无疑也会体现在德国的对华政策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文明力量理论有助于对德国的国际角色、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理解,进而更理性地看待中德关系的发展。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导师殷桐生教授的悉心指导和鼓励支持,在此谨向我的导师殷桐生教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

也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顾俊礼教授、潘琪昌教授和海德堡大学的哈尼施教授对本书的主题和脉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帮助我理清了论文的主线和思路。十分感谢刘立群教授、李文红副教授和吴江副教授为本书的撰写和修改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并热心为我推荐文献,丰富了内容。

特别感谢冯中林老师对书稿的文字表述和行文规范提出建议,帮助我不断完善论文。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各位领导和同事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各位博士生同窗在交流中带给我的启发和鼓励下,在家人和朋友的理解和体谅中,本书得以成型,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于芳

2014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文明力量理论	1
第一节 德国文明力量理论的产生	1
第二节 文明力量理论的内容	9
第三节 文明力量理论所采用的方法	18
第四节 评文明力量理论	26
第二章 文明力量理论形成的背景.....	31
第一节 20 世纪后期德国外交框架条件的变化及挑战	31
第二节 德国的国内政治发展及要求	36
小 结	40
第三章 文明力量理论形成的思想渊源	42
第一节 政治哲学	42
第二节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	47
第三节 角色理论	54
第四节 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德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影响	58
第四章 德国对文明力量角色的内化程度	63
第一节 德国外交政策是否符合文明力量角色标准	63
第二节 文明力量行为体的横向对比	72
小 结	85